

本期话题：访谈深圳图书馆原馆长吴晞先生

访谈深圳图书馆原馆长吴晞先生

□ 顾晓光 / 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 北京 100871

DOI: 10.3772/j.issn.1673—2286.2013.12.001

1979年第一期的《图书馆学通讯》（《中国图书馆学报》的前身），曾刊载了一篇后任文化部图书馆司司长杜克先生的《我国图书馆网建设初探》。文中列举了美国俄亥俄州有600多个分馆和90多辆汽车图书馆，“平均2500人一个分馆”，作者同时提出，“但在我国，我认为却不能走由大型图书馆广泛建立分馆这条道路。”

时隔三十多年，再看这篇文章，我感觉它并非已故前辈的妄言或者缺少高瞻远瞩的视野，而是当时百废待兴的中国之真实反映。在全球化和信息化的背景下，在我国国力整体增强的支撑下，中国的图书馆界近年来成绩斐然。成绩的背后，是众多图书馆人的不懈努力。

深圳图书馆原馆长吴晞先生即为其中有代表性的一位。他在任深圳图书馆馆长14年间，将深圳图书馆由一个新兴城市的小馆变成了“图书馆之城”宏大规划的龙头馆。目前，深圳“图书馆之城”已拥有600多家图书馆和200台城市街区24小时自助图书馆，这在改革开放之初的中国是很难想像的。

吴馆长是图书馆技术应用的有力推动者。无论是RFID还是自助图书馆，深圳图书馆都走在全国的前列。RFID在全国应用越来越广泛的同时，自助图书馆却得到了业界同行的一些争议。作为自助图书馆项目的第一负责人和专利发明人，即使自助图书馆在深圳的使用情况甚好，吴馆长也仍能理解这些不同的观点，更不赞成在全国盲目地推广。

他认为深图较多的技术开发和应用是不得已而为之，这与深图的文化 and 历史积淀较弱有关。这位有着很高人文素养的管理者和学者，将自己的人文情怀用在了服务上，除了以技术应用促服务，同时还在全国率先提出了“开放、平等、免费”的理念，“服务立馆，技术强馆”。

在开放的服务理念中，他也在思考诸多业内焦点事件后的“民粹主义”思潮。图书馆不能刻意去迎合普通大众，某些看似创新的服务实则为办馆方针的错位及对文明遗产和知识传承的漠视和无知。

他特别强调不能忽视图书馆的教育职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共图书馆宣言》中指出：“公共图书馆为个人和社会群体进行终身教育、自主决策、文化发展提供了基本条件”。他认为我们还没有完全发挥出开启民智的作用。在教育职能中，阅读推广是重中之重。

作为中国图书馆学会阅读推广委员会主任，他认为图书馆是社会阅读的主体，阅读推广工作要引导缺乏阅读意愿的人，训练不善于阅读的人，帮助有阅读困难的人，提供所有人阅读的便利。“目前还没有任何社会机构在阅读这一功能上可以取代图书馆”。

吴馆长热衷于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研究。他认为理论的研究推动了我国图书馆多年来飞速的发展。他发起创立了“公共图书馆研究院”和创办了《公共图书馆》学术期刊，这也符合他以“研究先行”为圭臬的一贯思路。

他同时认为我国理论的研究和事业的发展是西化的影响使然，不能忽视外来思想的作用。无论是技术的应用还是理念的更新，我们需要向国外学习的地方还有很多。

杜克先生的这篇文章刊出时，正值吴馆长刚刚进入北京大学求学，那一代大学生意气风发，以天下为己任，竭力摆脱荒诞的宿命，不再如西西弗斯回身走向巨石，用一己之力去抗争已知的悲剧命运。他们见证和参与了中国图书馆的发展，他们对于中国图书馆的贡献担得起这个社会 and 时代给予的期望和信任。

他因为身体原因，于2012年辞去了馆长一职，虽退离管理岗位，却也难做“无怀氏”和“葛天氏”之民，并不得闲。他还要接着完成手头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履行几个职位的责任。心系图书馆是他不变的情怀。

顾晓光：请您回顾一下在北大学习和工作的情况。是什么原因，让您下决心南下深圳，担任一个新兴城市的图书馆馆长？

吴晔：现在的青年人很难想象我们这一代人在青少年时期肚皮和精神双重饥饿的情景，这种饥饿已经成了我们终身的心结和阴影。

记得当年在河北省做插队知识青年，只有十六七岁年纪，我们这些人就像是一群觅食的老鼠，到处寻找有字迹的东西读。在村里找到一本没头没尾的旧县志，现在回想应该是清末同光年间的刻本，我们就如饥似渴读了起来，以至于至今我还能清楚记得本县从古至今都出了哪些夫死几十年誓不改嫁的贞洁烈女。

就是对这种读书的追求，使我考上了北大图书馆学系。1978年高考，我的成绩名列前茅，当时是先公布分数后填报志愿的，本来选择余地很大，但还是毫不迟疑地将北大图书馆学系（注：现为信息管理系）作为第一志愿。上学后，发现很多同学都有共同的想法，可见要读书是我们一代人的共同愿景。有个同学说：此生有饭吃，有书读，足矣！颇得大家共鸣。当然，读了图书馆学，做了图书馆员，才明白图书馆工作和个人读书是两回事，这是后话了。

顾晓光：我特别钦佩77、78级的大学生，这些人的求学背景和经历在古今中外都是少见的。

吴晔：我们这几届毕业生的共同特点就是踌躇满志，以天下为己任，还带几分狂狷和自不量力。记得毕业时一次聚会，有位女同学说：中国现代战争实际上就是黄埔军校的同学们在互相打仗，我们就是黄埔一期，今后图书馆的天下就是我们的！大家为之喝彩。虽是书生之见，但却难得一腔书生意气。

我毕业之后留校工作，工作、家庭都很顺利美满，我的中级、副高、正高职称都是未到年限破格提拔的，颇得领导和同事的器重和认可。1996年调到文化部图书馆司

深圳图书馆外景



任文献资源处处长，后来才知道，让我这个未经行政任职阶梯的人直接出任正处长，也是一种破格待遇。

1998年，深圳图书馆（以下简称“深图”）沈迪飞老馆长面临退休。沈馆长曾在北大任课，是我的老师，他推荐我接任馆长。市文化局也希望找一位既是内行、又有行政经验的人接替馆长，于是就发函商调。当时我也颇为犹豫，因为我的家人和父母都在北京和天津这两个城市，北京又是我的出生地和事业起步的地方，确实有些舍不得。最后还是事业心占了上风，人生苦短，难得几回搏，应该在有生之年多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顾晓光：深圳市委市政府提出建设“图书馆之城”已有10年的时间了。无论从同行的眼里，还是民众的心里，认为你们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您如何看待这10年的工作，在任期间还有哪些未了的心愿？

吴晔：我到深图任职前，对自己的专业能力还是信心满满的，以为自己是科班出身，又在国内一流图书馆工作多年，图书馆的十八般武艺都拿得起。但跻身公共图书馆后，发现差距还是蛮大的。

这个差距，首先不是我个人的差距，而是我们整个图书馆界的差距。我们的教科书、理论研究乃至公共图书馆界自身，都缺乏对公共图书馆的整体认识，没有令人满意的研究成果，更没有落实到公共图书馆的工作上。其实这个问题在国际上早已有共识，从《公共图书馆宣言》到IFLA等国际组织早就有一系列的定论，我们的公共图书馆却大多懵懵懂懂，一团乱象，政府管理部

门也是政策错位。当时盛行“以文养文”，经营创收，提倡增加“造血”功能，实际上就是想方设法乱收费。对群众办证、借书设立了重重门槛，把读者分为三六九等，就像个衙门。深图在全国算是做得好、问题少的，但也不能免俗，职工奖金和本部门“创收”挂钩，全馆上下都在一门心思搞钱。

这种乱象在本世纪初年才开始好转，直至2012年文化部、财政部发文禁止图书馆、博物馆等公益文化场所收费，才算终结了全国公共图书馆以服务“创收”的局面。在这个历史进程中，深图起到了为天下先的作用，这是我为之自豪的。

早在1998年就职深图之初，我就写了《图书馆与人文关怀》一文发表在湖南《图书馆》杂志，呼吁图书馆人文价值观，介绍国际先进理念，抨击图书馆服务不平等、滥收费等不正之风。本世纪初年，国内理论界开始倡导图书馆的核心价值观，反对一些不合理的政策和做法，我也推波助澜，撰写了《天下之公器》等一系列文章，力图在理论观念上拨乱反正。2006年，深图新馆开馆，我们借此良机，大张旗鼓提出了“开放、平等、免费”的口号，在全国首先做到了服务全部免费（与我们几乎同时实行全部免费的还有杭州图书馆）。当时我们这样做还是有不少压力的，因为没有明确的政府政策，许多公共图书馆还要靠收费过日子，难免要说我们“饱汉不知饿汉饥”，“站着说话不腰痛”，但是也得到了图书馆界有识之士和市民读者的热情支持和赞誉，使我们得到鼓舞。

深圳的“图书馆之城”是全市图书馆事业发展的一个亮点。作为公共图书馆的一个特点，就是要面向基层，面向大众，面向弱势群体，“图书馆之城”建设体现了这种精神。现在全市通过考核达标的基层图书馆已经有600多家，深图还牵头建成了“深圳图书馆之城统一应用平台”，把全市图书馆联为一体。这项大工程得到市政府的大力支持和全市图书馆界同仁的一致参与，使全市人民因此而受益。

还有一项惠民的工程就是开发研制“城市街区24小时自助图书馆”，我们是将其作为“图书馆之城”的组成部分来进行建设的。现在全市投入服务的自助图书馆已达200台，深受市民欢迎。

曾有学者指出，21世纪中国图书馆有两大成就，一是各种新技术在图书馆应用，极大改变了图书馆的面貌；二是公共图书馆免费开放，实行均等公益的方针。我深以为然。然而，新技术应用是技术领域、主要是IT界的引领，我们不过是跟在后面跑。所以说，近年来国内图书馆界最大的成果应该是公共图书馆界的变化，实行了开放、平等和免费的服务。回顾这一历史性转折，我和深图团队始终站在了潮头，在理论上、实践上冲锋陷阵，颇有成就感。

顾晓光：深圳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城市，也是受惠很大的一个城市。经济繁荣促进文化的发展，虽然有些人说深圳是“文化沙漠”，但通过经济的投入，在文化的某些方面，比如图书馆，深圳是不是走在全国的前列？

吴晞：“文化沙漠”是有些刻薄了，深圳的文化发展还是很快的。但深圳是一座文化底蕴很薄弱的城市，且



深圳市“图书馆之城”中心管理系统界面



“图书馆之城”统一服务全面启动

不要跟北京、上海比,就是和广州比,也有很大的差距。虽然我们做了很多事情,包括我在图书馆方面也做了很多努力,但文化建设需要很长时间的积累。

拿深图来说,我们硬件条件是走在全国图书馆前列,我们在自己尽可能的条件下所做的一些工作,确实也走在全国前列,比如建设“图书馆之城”、促进基层图书馆发展、开发并使用自助图书馆等新技术应用等方面。但如果作为一个好的图书馆,深图以及众多深圳地区的图书馆还有很大的差距。

顾晓光:这个差距主要体现在哪些地方?

吴晞:文化积淀不够。我们八十年代之前的图书收藏很少。以前,我们班子开会争论是否收集古籍,丰富馆藏。多数意见是不收集,买一些复印本或者通过数字化方式获得就可以,满足读者使用。虽然我本人对古籍很感兴趣,但也没有坚持收藏古籍。

我们之所以在技术的开发和应用上做得较多,实际上有不得已的原因。如果藏有大量古籍、镇馆之宝,我们会有很多事情可做;没有这些,我们只能想办法在技术上走在别人前面。如果我做其他图书馆馆长,也许不会走这条路,有很多办馆的方针可以让图书馆长久发展。

顾晓光:上个月我参加首都图书馆百年馆庆活动,在会议上有专家说“图书馆促进社会发展,图书馆接受技术挑战”。“挑战”这个词很直接,我想到图书馆学作为一个学科,有诸如分类、编目的看家本领,但技术的发展使得我们学科的这些看家本领越来越弱势化了,使得图书馆的技术应用有越来越多非本学科独有的趋势。您觉得这种现象以后会不会更加明显?

吴晞:这也是很无奈的,连我们系里的名字都改成信息管

理系。改名的时候,我还在北大。当时我很反对,觉得把学科给改没了。这从根本上将专业往技术上靠了,依赖技术发展来建立学科,学科立足之本的东西丢掉了。这带来什么后果呢?首都图书馆倪晓健馆长很多年前讲过一个故事,在搜索引擎上敲入“信息管理”一词,一万条之后也找不到图书馆。我们图书馆招聘的时候,投递简历中符合“信息管理”专业条件的有学硬件、软件、电子商务的,就是没有图书馆学背景的,搞得我们哭笑不得。

但学科发展到今天,离开技术是不可能了。我们深图也是紧跟技术发展的。但图书馆学是一个人文社会学科,不能离开“以人为本”,不能为了技术而技术。

顾晓光:深图是国内进行新技术应用的典范,无论是ILAS还是RFID(无线射频技术)、自助图书馆等,但您以前说过“图书馆的本质是人文的,在过去和将来,它都不是什么科技产物”,刚才又谈到“不能为了技术而技术”。在技术大力推动图书馆发展的今天,技术和人文的争论中,人文又能如何去引领技术的进步?

吴晞:深图开始研制开发ILAS的时候,我还在北大供职。记得当时(19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曾由学校牵头,北大图书馆和计算机所合作,先后成立过两个图书馆自动化课题组,我都是课题组成员。在我们课题组里,那些搞计算机技术的专业人员是不大看好深图ILAS的,认



ILAS 20周年会议



RFID书标

为他们技术上是小儿科。结果，我们的项目或是无疾而终，或是通过鉴定后束之高阁，从未得到真正应用（似在北大图书馆短期试用过），而ILAS却在全国有了三千多用户，还走向了海外。

我到了深图之后，才认真面对这个问题。ILAS是文化部支持的项目，从一开始就立足于推向全国图书馆，为图书馆自动化服务，迅速实现产业化，而不是刻意在技术上取得什么成就或突破，追求什么成果。这一策略被证实是十分成功的。且

举一个非技术性的例子。当时国外通行的图书馆自动化软件主要是美国的INNOPAC，售价超过30万美元，每年的维护费用还要2万美元。这个价格实际上超出了当时国内几乎所有图书馆的承受能力。而ILAS的售价最低只有5,000元人民币，因此被广泛接受。仅仅这一点，就可以说ILAS的问世使中国图书馆的自动化提前了10年到15年，因为只是近10年左右国内各大图书馆才有财力陆续使用国外的系统。

我们做公共图书馆的，时刻要有人文关怀的理念，而不是本末倒置，技术成就高于一切。再举一个我个人的例子。90年代初期，我在北大图书馆供职，当时我们经过努力，宣布取消原有的卡片目录，全部采用机读目录（MARC）。这在全国高校图书馆是首家，我们都很以为荣耀，当时在国内图书馆界也是一件重大的事情。不久后我到美国出访，得知了另外一个故事：在美国的一家大学，当时也曾计划取消卡片目录，但是因为有几位教授从不肯使用电脑，图书馆最后决定卡片目录依然保留。两种做法，反映了两种态度，两种考量。这里且不说保留卡片目录的是非对错，毕竟现在图书馆大多已经不再使用卡片，但是美国这家大学的出发点无疑更具有人文关怀的精神，而不是技术至上主义，不是为技术而技术、为现代化而现代化。这正是我们所缺乏的。

正是基于这种考量，深图研制开发了“城市街区24小时自助图书馆”。对于这个项目的研制和使用，业界也有不少争议，有人认为我们采用最先进的技术手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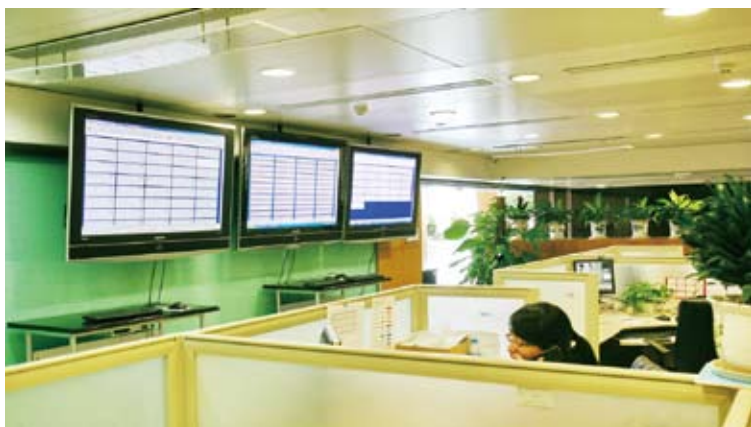
却用于最传统的纸本书刊借阅，不能体现图书馆的发展方向。对此我不能苟同。仅2012年，全市自助图书馆就借书1,053,084册，还书1,217,989册，预借135,442册，服务读者1,355,270人次。今年5月仅一个月，借书89,686册，还书105,803册，预借13,201册，接待读者115,927人次。这些数字说明什么？说明我们的自助图书馆相当于一个中等以上规模的图书馆，而且是深受市民关注和欢迎的图书馆。这样的利用效益，又有多少潜移默化、润物无声的社会影响，这才是我们应该追求的。

曾有一位女市民动情地对我们的工作人员说，自己在深圳发展不顺利，正在考虑回老家，但使用了自助图书馆这样便民的服务设施，就改变主意不走了，留下做一个深圳市民。自助图书馆项目问世后得到过多次领导表彰和各种奖项，包括胡锦涛总书记的赞扬和文化部颁发的最高荣誉“文化创新奖”和“群星奖”，但这位女市民的赞许却更令我们倍感荣耀，让我从中切实感受我们做了图书馆应该做的事情，尽了我们的社会责任，体现了图书馆的社会价值。

顾晓光：“以人为本”的理念有形无形地嵌入在众多学科中，如果老是将“以人为本”挂在嘴边，会不会让人感觉有些“无奈辩护”？



城市街区24小时自助图书馆



自助图书馆监控中心

吴晞：从技术本身来讲，确实不能老以“以人为本”做说辞。图书馆分很多种，公共图书馆比较不一样。它是一个社会公益文化机构。

顾晓光：它面对每一个个体。

吴晞：不能离开为公共服务这个原则。我们建深图新馆时，有人提过一个方案，一进大厅便有大量电脑进行多媒体展示，能够让大家感受新技术的魅力。这个想法很好，但我还是反对。我们不能摆出一副吓唬人的架势，要让老百姓感到很亲切，有文化的可以来，没文化的也可以来；骄傲的可以来，自卑的也可以来。它对民众要有亲和力。当时，深圳有位书法家送我们一幅字：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我说这不行，既欢迎鸿儒，也欢迎白丁，尤其要加强白丁的服务。本来书法家很得意，觉得很高雅，但我们觉得不能充高雅，要特别面对那些弱势的、没有多少途径阅读的群体。他们很依赖我们，我们也要吸引他们来，这才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

顾晓光：这样说，图书馆能不能通过企业运作的方式来做？我们有现成的资源，通过技术的应用和更加有效的管理来运营图书馆。

吴晞：我看到日本的一些图书馆外包给企业，政府以前给图书馆投入多少，然后转给企业来办。这种外包式服务有它的道理，是不是成为趋势，还需要假以时日。虽然日本有这样的例子，但还不是一个潮流。

另外，图书馆还是有很强的专业性，但我们的专业性没有得到广泛的认可。如果让我去医院当院长，我就

不敢去，因为我不懂专业。但如果派个人来当图书馆馆长，专业上就没有那么高要求了。现在有些城市还搞干部轮换制，把文化馆馆长换到图书馆做馆长，把图书馆馆长换到博物馆去。任期超过多少年需要轮换，这在机关里有合理性，对于干部和工作都有好处，但不适合专业性工作。

这就看出我们学科和专业性没有得到社会承认，同时我们的教育又不断脱离图书馆本身。有些大学的专业学生大多都不去图书馆工作。我离开高校很多年了，他们也有无奈的地方，也有合理的地方。

顾晓光：您在2000年时，曾经说过“公共图书馆要不要建成研究型的图书馆，这是个有争议的问题”，并提出“我们（深图）必须担负起研究图书馆的使命”。经过10多年的发展，您认为深图在推行研究图书馆战略上有哪些经验？

吴晞：从数量上看，全国县以上公共图书馆有三四千家，大多是基层图书馆，这些图书馆要不要办成研究型图书馆，我不能肯定；可以肯定的是，像深图这样的大型地区中心型公共图书馆，是一定要担负起研究图书馆的使命的。

我多次说过，在当今社会，要进行某种程度的研究，或系统学习掌握一门知识，就要学会利用图书馆这个最好的场所，因为只有图书馆才具有完备的文献体系和系统的文献服务。人们常说“站在巨人肩膀上”，这个“肩膀”就是前人的成果，就是文献，就是图书馆。

举例讲，如果某一学科或专题的有关文献有100篇，其研究者或学习者至少要掌握其中的80篇，还不能遗漏核心文献，才算得上有起码的了解，才算入门。哪里去找这80篇文献呢？社会上只有图书馆才能提供这样的文献保障。书店能否完成这样的功能呢？不能。书店只能提供当年及近年的新书，甚至只是有销路的新书，不会系统地按照学科、专题来收集和积累文献，也不会提供卖不出去的书刊。上网浏览检索固然可以获得大量信息，但属未经筛选，垃圾信息充斥，个人往往没有能力甄别利用。凭借个人的收藏和私人途径能否建立起这样的文献保障体系呢？应该承认，历朝历代的私家藏书曾经起到过非常积极的历史作用，为文化传承、文献保存和文献研究作出过不可替代的重大贡献，

许多重要的学术成果也是以此为依托完成的。但毕竟时代不同了,藏书家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远在两千多年前的古代社会,对文献数量最为夸张的形容不过是“学富五车”、“汗牛充栋”。即使当时的文献总量如此有限,孔子还要“问礼”于“周藏室”(周王朝的国家图书馆),亚里士多德还要借助“学园图书馆”。可以说,面对今天的出版量和社会信息量,凭借个人的力量已经不可能建立起完备系统的文献收藏,只能依靠社会化的分工,也就是依靠图书馆及其他社会文献机构。这就如同生病要找医生,上医院,寻求专业帮助,靠个人买些感冒胶囊之类的只能对付一些头疼脑热的小毛病。

进入网络化、数字化时代之后,图书馆独特的、不可替代的社会作用非但没有减弱,反而更加强化、更加突出了。图书馆为我们提供了丰富实用的数字资源,图书馆收藏和提供各种的数据库,如同图书馆的藏书一样,是经过精挑细选和专业化整理揭示的,因此是最重要、最实用、最具价值的信息资源,而且大都是免费提

供使用的。无论是普通读书人,还是读书治学者,图书馆数字资源都是基本资源和首要选择。

特别要指出的是,即使你所在的图书馆数据库不够齐备,使用者另有需求,现在图书馆大都可以通过各种图书馆协作关系和资源共享平台,联系利用其他图书馆的数据资源,这些服务都是无偿提供的。以深圳为例,深图和深圳大学城图书馆、深圳大学图书馆这几家本市数字文献收藏最为丰富的图书馆一起,建立了“深圳文献港”,可以相互利用各自的馆藏数字资源;而大学城图书馆又是CALIS成员,我们也可以利用这个平台的文献。此外,我们和大陆各大图书馆、港澳地区图书馆及国外文献机构都有各种各样的业务关系,可以实时利用他们的数字收藏。这样一来,“研究型公共图书馆”的门槛就大大降低了,许多具备条件的基层图书馆也同样可以开展研究型服务。

建立在数字文献基础上的研究型图书馆的好处是不言而喻的。有个历史学研究者就说过,只要学会利用各种数据库,每个研究者在占有资料上都可达到陈寅恪先生的水平。这是深得个中三昧者之言,也给公共图书馆发展提供了方向,就是在数字图书馆的基础上建设学习型、研究型图书馆。

顾晓光:我们图书馆学专业中在不同时期出现过“整理说”、“要素说”、“机构说”等理论,到后来周文俊老师提出“文献交流”的思想,图书馆学的研究经历了很大的变化。新世纪以来,很多人开始认同一个图书馆作为公民“第三空间”的观点,图书馆利用物理空间和馆藏资源的优势,来建立一个文化氛围的场所。在传统文献资源的利用日渐式微的情况下,图书馆越来越多地利用非传统图书馆的服务方式来进行服务,甚至有去纸质图书化的趋势。在图书馆独有物理空间优势的情况下,我们的图书馆还是图书馆吗?

吴晞:你这是两个问题。一个是基础理论。我深深感受到21世纪的基础理论有了更为深入的研究,比如2005年湖南《图书馆》杂志推出的“21世纪新图书馆运动”论坛,在理论上做出了很大的突破。按说也没有什么新东西,《公共图书馆宣言》早就讲了,国外也已说了、做了有多年。但将其介绍到中国来,为其鼓与呼,并形成公共图书馆今天的局面,还是起到先锋的作用。

七八年前,我们的公共图书馆还存在收费、设门槛这样的举措,很多馆长也没有开放的理念。在上世纪末



深圳图书馆内景



基于RFID的文献智能管理系统

到本世纪初,基础理论的研究者,包括我在内,还是推动了图书馆事业很大的发展。刚才你说的以前学者提出的基础理论,包括周文俊老师的“文献交流引论”,最核心的东西还没有过时。

另一方面,现在资源多样化,人们不再依赖图书馆,这是一个事实,包括你和我在内。我们查找资源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通过互联网,这和我以前一有问题就钻进书库里是类似的。但是人们总是需要一个物理空间,即使你掌握了全面的信息检索技术、数字文献利用技术,但你还会有一个书房。如果你没有,可能也希望设计一个理想中的书房。

顾晓光: 是的,在数字大潮下,我购买纸质书却越来越多。

吴晞: 在自己的书房中,琳琅满目,这和拿个手机查东西是两个概念。对于城市来说,也是如此。城市的公共图书馆是一个文化象征,在其中,我们可以查阅传统资源,也可以浏览网络资源。在上世纪80年代,信息技术刚刚兴起,美国超过70%的民众(具体数据记不清了)是通过图书馆掌握了相关的新技术应用,包括后来的互联网。我在文化部的时候,曾经提过一个口号“图书馆带你步入信息社会”,得到领导认可,他们现在还在用。我们面对的公众是参差不齐的,我们有责任让没有其他途径学习的人逐渐掌握利用新技术的本领。从这方面说,仅仅着眼资源建设是不够的。

顾晓光: 您刚才讲的基础理论的研究和传播,直接影响到政府的决策,使得这几年公共图书馆有了很大的变化。从另外一个侧面来看,这段时期和互联网的发

展,包括Web 2.0的广泛使用是同步的。2.0的理念本身就具有开放、平等、共建、共享的特点。我们同时也受惠于互联网的发展带来理念上的更新。

从这个角度,我想到一个您和一些学者以前都持有的观点。大意是中国百年来公共图书馆的发展,是全盘西化的落地,甚至很难有什么中国特色。当然,既然在中国,肯定有中国化的成分在其中,但并不明显,基本上是理论的移植。现在您是否还坚持这个观点?

吴晞: 是。中国的书籍历史非常灿烂,文化遗产也非常丰富。从这方面讲,我们比西方大多数国家要有优势。但今天我们所说的“图书馆”就是舶来品,是西方的产物。我们近代图书馆的产生、发展就是移植过来的,不是继承了诸如天一阁、文渊阁这样的藏书楼。

我在上世纪90年代就发表过这个观点,很多人反对,说我无视我们的文化遗产。我说你们没有把我的文章看明白,如果看明白了,就不会这样说了。这个观点也没有什么奇怪的,我们现在使用的东西大多是舶来品,小到身上穿的衣服,大到像共和国这样的国家体制也是西方的。我们的图书馆会受一些传统的影响,我们的目录学以及关于文献学的研究,对于今天的图书馆还有指导作用,但和今天的图书馆学和图书馆体制是两回事情。

顾晓光: 关于目录学和文献学研究,在1949年前后,我们的图书馆管理者和学者很多是传统的文献学家、目录学家,像王重民、向达、顾廷龙等先生。他们在其他学界和社会上有一定的影响力,而且在近代图书馆的发展起到很大的作用。当然也有像刘国钧、袁同礼等先生这样的图书馆学专业出身的学者和管理者。但现在我们的图书馆的从业者和学者在社会影响力方面感觉弱了,西方图书馆界这种现象也是这样。您认为这是什么原因,是图书馆行业更加独立了?

吴晞: 刚才说近代图书馆是舶来品,像刘国钧、袁同礼等先生,他们就是将西方的东西介绍到中国来,刘国钧依照杜威分类法,编了中国图书分类法,虽然很了不起,但体系是杜威的。让他们超越国外的同行是很难的,我们不能苛求他们。但像王重民这样的学者,研究中国文化,国外学者很难超越。

知名学者做图书馆馆长,以前国家图书馆馆长任继愈先生算一位。在高校,有名望的教授担任馆长的现象较多,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坏事。图书馆本身是开放的,

也许其他行业的人对图书馆的理解更深入一些,也许能另辟蹊径。深圳有《深圳经济特区公共图书馆条例》,其中有设立图书馆员职业资格认证制度。市级图书馆馆长必须有图书馆的副研究馆员职称,或有五年以上图书馆工作资历,这样的规定在全国并不多见。

顾晓光:您认为我们图书馆的发展和整个中国的发展相比,是同步的,还是超前的?

吴晞:在深圳,可能是超前的。“图书馆之城”正式认可的图书馆就有600多家,而且都是达到一定指标的。在西方国家,这也是很高的数字。我们还有200台自助图书馆,再加上鼓励民间图书馆的投入,而且,深圳离香港近,很多地方都要和香港去比较。所以深圳地区的图书馆发展还是很快的。

不太了解具体的情况。在全国范围内,大型图书馆的建设是非常突出的,这几年出现了像广州图书馆、湖北省图书馆这样单体面积超10万平方米的图书馆,在世界范围内都是很少见的。虽然现在的理念并不是非要建大馆,要多在基层馆上投入,但这也是社会发展的象征。

我们公共图书馆的发展让美国同行很羡慕,这几年美国关闭了一些图书馆,规模缩减、购书费缩减、人员缩减。

顾晓光:我们之前经常说古希腊时期托勒密王朝的埃及亚历山大图书馆毁于大火,现在有一篇文章([http://io9.com/the-great-library-at-alexandria-was-](http://io9.com/the-great-library-at-alexandria-was-destroyed-by-budget-1442659066)

[destroyed-by-budget-1442659066](http://io9.com/the-great-library-at-alexandria-was-destroyed-by-budget-1442659066))有了新的说法。作者认为亚历山大图书馆的衰亡直接原因并非意外的大火,而是当政者对其经费投入上的削减使之慢慢衰落。

英文中有个词叫furlough,大意是强迫性无薪放假,如果再严重点,就是临时解雇。美国国会图书馆今年曾经要求馆员每人furlough三天,以应对经济危机。

吴晞:美国各州图书馆的政策不一,有的好些,有的就不行。上海图书馆吴建中馆长曾经说过,中国图书馆发展的黄金时期已经到顶了,很快就会走下坡。我觉得有道理。现在惯性还在,但往后不会再有这么快的发展。

顾晓光:是的。这也与国际上整个行业高速发展有关,比如数字图书馆的广泛应用和信息时代的到来,也借助中国城市化、城镇化建设的大规模投入。这让政府有了投入的理由。

吴晞:我们有很好的项目能够让领导承认,让社会承认,那就容易做得成。“图书馆之城”也是这样一个例子。我现在还有很多想法,碍于精力不够,已经很难去做了。领导认为我们是文化人,对我们有种天然的信任感,有助于我们去工作。

顾晓光:刚才您谈了一些对图书馆发展的认识和思考,我想再请您评论几个这些年来图书馆界一些细小举措的变化,有代表性,也有一些争议。比如,我看到过一位读者在微博上抱怨深图,大意是在南方某个图书馆借书都不要钱的,而跑到深圳后,要先交钱才能借书(100-300元不等),并认为此做法为“权力寻租”。您如何看待这位读者的抱怨?

吴晞:此事缘起于某些图书馆近期出台的“服务创新”:免收借书证押金。我多次表示对此不敢苟同。

本世纪以来,中国的公共图书馆进入了全面免费的时代。免费服务在公共图书馆近乎“天条”,蔚成一时风气。恰如有的学者指出,这是本世纪中国图书馆、尤其是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最为重大的进步和最为丰硕的成果。我本人和我所供职的深图就是其首倡者和积极推动者。



基于RFID技术的智能书车



深圳图书馆内景

真理超越半步，往往就是谬误，就陷误区。孔子说“过犹不及”，也是这个意思。当今某些公共图书馆推行借书证免收押金，并自诩为“服务创新”，就超越了图书馆的底线。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的底线，而图书馆的底线之一，就是其藏书。建设藏书，保护藏书，进而汇聚知识，传承文明，是图书馆最为重要的天职，是图书馆之所以成为图书馆的本质特征。图书馆的这种功用被卡尔·波普尔称为“世界三”，国人也有“诗书继世长”的优良文化传统。图书馆的任何行为，都不能以损害其藏书为代价。

当今某些公共图书馆实行的借书证免押金政策，恰恰是以“借书不还”为代价的。某些地方领导甚至明确表态，由此造成的图书馆书刊丢失损失全部由财政增拨款项买单。在他们眼中，这是一项“惠民”的好事，如同是在给市民开粥厂、派红包、发利是，图书馆书刊的损失可以用金钱来补偿，馆藏的文献也是可以作为福利赠送给市民的。这是图书馆办馆方针的错位，也是对文明遗产和知识传承的漠视和无知。

图书馆收取押金来确保藏书免受损失，不是唯一的方式，甚至也不是最佳的方式。在高校和其他一些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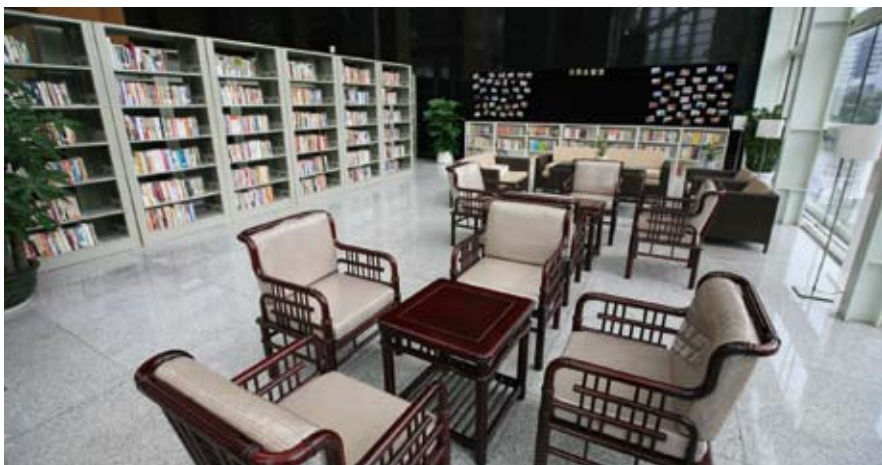
固定读者群的图书馆，就无需用钱来做抵押。在香港和许多西方国家的公共图书馆，都是不收取借书押金的，居民诚信本身就是担保。但是在公民信用制度远未建立的我国大多数地方，如果不是寻求建立可以取代押金的担保制度，而是不惜损失图书馆的文献收藏，去搞此类“服务创新”，则有悖于图书馆的宗旨。

在一些公共图书馆，尤其是基层图书馆和社区图书馆，把多余的藏书廉价售给居民，甚至免费赠送，都是允许的，这也是西方社区图书馆常见的做法。但是无论如何，不能容忍“借书不还”，不能让那些品行有亏、需要教育惩戒的人享受这一“福利”，而让广大遵纪守法的公民蒙受由此带来的损失，如加大财政开支、损失公共文献收藏。就算是派红包、发利是，也要有个公平合理的发放途径和发放标准，不能混乱无序，更不能恶人先得。

我十分赞赏吴建中馆长的说法，公共图书馆发展是有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的：最低纲领是实现社会公正包容的使命，确保为每一个公民提供公平的服务；最高纲领是提供知识服务，为各界人士自由交流信息、共享人类知识提供一个信息化环境。这也是当前图书馆发展的两大目标、两大使命。我觉得，这两个纲领不是孰先孰后的关系，而是要并行不悖，齐头并进，图书馆方能健康发展。而图书馆藏书的齐备健全、保存完好，则是最基本的条件，尤其是实施知识信息服务这一“最高纲领”的前提和保障。

顾晓光：还有一个话题是杭州图书馆的“乞丐事件”，它成了少有的关于图书馆的社会话题。其中有两种观点，一种是主流的，一片叫好声，这体现了图书馆的开放和平等。另一种声音在思考此事件体现出的平等和公平的问题。平等和公平看似很像，但实质上，我们在推广平等的同时，可能丧失了公平。这种观点并非否认杭图对此事的做法，而是借此事来思考公共图书馆对读者的态度。在某种程度上说，平等和公平是相悖的，平等会以牺牲公平作为代价，公平又会引发不平等的现象出现。

吴晞：现在有一种“民粹主义”的思潮，我们图书馆界也存在这种思潮。我对一位学者开玩笑说他就是宣扬“民粹主义”，图书馆不是收容所。杭图这件事情从本质上说是对的。我们宣扬图书馆平等这么多年，连乞丐都不让进实在说不过去。读书人都是平等的，不论什么阶层。我也曾写文章赞成此事。



深圳捐赠换书中心

但我们公共图书馆现在忽略了“教化”的责任。我提这个，有学者就反对，他们就说你把读者分成三六九等。我在图书馆就要求读者不能穿拖鞋、背心。我们做事情要有个样子，读书就要有个读书的样子，图书馆也要为提高民众的文化水平和精神培养作点贡献，至少也要培养一些文明的习惯。

顾晓光：这也是尊重其他读者的做法。

吴晞：是这样。图书馆的教育职能还是不应该否定的。台湾地区的图书馆归“教育部”管理，这样它的教育职能就非常明确。它是教育的一部分，民众通过在图书馆读书来实现图书馆的社会教育、终身教育的职能。我们的图书馆归文化部门管理，它的教育职能就淡化了，属于文化活动的一部分。

顾晓光：在做复旦大学图书馆葛剑雄馆长访谈（注：本刊2012年第八期）时，我引用了一个例子：有位深圳市民去深图，结果深图由于检修而没有开放，他在微博上表现出不满。就此，我请葛先生谈了他的看法。您怎么看待公共图书馆365天开放？

吴晞：我不知道这位读者指的是哪件事，似乎深图从未因检修而关门，只是每逢周一例行闭馆。我很赞成葛馆长在访谈中的观点，不应强求图书馆365天开放，尤其是不必在法定节假日开门。

深图一直实行每周一例行闭馆的制度。很多时候有压力，来自领导，来自读者，也来自那些大力宣扬365天开放的某些图书馆。但每周有一天缓冲是十分必要

的，馆员要轮休，设备要检修，就是组织全馆职工活动也要有个完整的时间。我们有200台自助图书馆全年24小时开放，同时我们协调全市各区图书馆，不要都是周一闭馆，时间错开，满足读者借阅需求应该不成问题。

节假日闭馆制度也是必要的，国外图书馆大多如此，但我们很难实行。这主要在于公共图书馆受文化局统辖，属于文化系统，而这个“文艺界”在节假日是最为忙碌的，主要演出和文艺

活动都集中在这个期间，各个文艺团体和机关领导干部在节假日加班是常态。他们不认为同在文化系统的图书馆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公共图书馆理应为假日文化繁荣作出贡献。

顾晓光：您和葛先生一样，都是在之前全开放的情形下，顶住压力，转为实行部分时段闭馆的。我将葛先生的观点发在微博上，几乎是一边倒地支持他。这条微博被转发了300多次，转发的人大多是图书馆员。我们的研究者和管理者都在倡导“以人为本”的理念，这里面既要以“读者”为本，也要以“图书馆员”为本，而对于后者，我们的很多管理者做得有失偏颇。

现在深圳已经有200台自助图书馆，但对于这个设备的使用，您前面也提到在业内有不少争论，特别是在书社会（<http://librarysalon.com>）有个集中的讨论。

吴晞：它在深圳的使用情况不错，市民欢迎，达到了我们的目的。我也理解很多不同的观点，包括认为这是逆图书馆发展潮流的做法。但是从我前面提到的自助图书馆利用数据看，民众对它的需求也是非常大的，这就是最好的理由。

顾晓光：还有一种说法是，自助图书馆只适合像深圳这样经济发展较好的城市，不具有普遍适用性。

吴晞：我同意，不主张盲目地宣传。现在的宣传不是我们的本意，经济不发达地区使用它，不是什么好事情。还有，很多来深圳考察的其他地方文化局领导、图书馆馆长都对它的原理、网络结构不清楚，更不知道

用什么平台来支撑、如何将资源通用起来、物流怎么管理,只是觉得这是个好东西,就拍板购买。如果图书馆没有充分调研就投入使用,我就非常害怕,怕他们花了钱却使用不佳。

虽然我不赞成盲目地推广,对于深圳来说,它确实是一个好东西。

顾晓光:自助借还机是中国首创的,主要的应用也在中国,包括台湾地区也有。最近我看到一个新闻很有意思,美国也开始使用这类设备,但与中国的情况相反,他们是没有钱盖实体新馆,用它来替代。

吴晞:把自助图书馆说成是图书借还机是贬低它了,它是一个图书馆,通过它,读者可以预借、OPAC查询、办证等,图书馆很多功能都可以实现。我们当时不知道费了多少苦心来设计。

顾晓光:新世纪以来,图书馆面临的机遇和挑战一直是业内的焦点话题。对于图书馆来讲,无论是“最好的时代”还是“最坏的时代”,“天下之公器”的地位受到了互联网资源的冲击,也受惠于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您如何看待Google和Amazon这样的互联网“私器”在“开放、平等、免费”方面对于“公器”的挑战?

吴晞:“最好的时代,最坏的时代”,是大文豪狄更斯在《双城记》中的名言,是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社会急剧发展、各种矛盾突出爆发的写照。现在人们喜爱引用这番话,是因为我们今天的社会与之颇有几分相似。

我觉得,今天的社会阅读、尤其是图书馆阅读,也是“最好的时代,最坏的时代”,根源都在于以IT技术为代表的各种新技术的涌现并在阅读领域大量应用。其表现,一方面是新技术极大地扩大了阅读的领域,资源极大丰富,获取极大方便,检索、利用手段日新月异,给图书馆乃至整个社会带来深刻变化,这是我们的前辈图书馆人未曾遇有的大好形势和发展机遇。另一方面,也给与阅读相关的出版界、书店和图书馆等机构带来危机。你所说的Google和Amazon带来的风波只是一个方面,这种新技术的冲击是全面的、总体的、带有根本性质的。由于读者阅读习惯的改变,社会信息渠道日益多样化,读者对图书馆的依赖程度降低甚至流失,使图书馆有了消亡的危机。近来业界出现过许多悲观的论点,甚至提出为图书馆做“尸检”(尸体

解剖)。恰如“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新技术是一把最好的和最坏的双刃剑。

如果说“尸检”之类的说法还有些危言耸听,还不至于迫在眉睫的话,一些十分迫切的问题,如纸本资源收藏与否、传统文献与数字文献的关系、比例问题,就很现实地摆在图书馆面前,使我们不得不面对,不得不拿出解决的思路、方案。

在这个问题上,国内图书馆界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并出现了一南一北两大腕级的代表人物。一位是北京的国家科学图书馆张晓林馆长,他多年大力倡导“电子文献先行(e-first)”,“网络先行(i-first)”,有人说他恨不能将所有纸质文献请出图书馆。另一位是广东中山大学图书馆程焕文馆长,他的宗旨是“保留一切有价值的纸片”,恪守纸质文献的核心地位。

那么,这两位大腕儿,我们到底应该听谁的呢?我历来主张两点:一是思想要激进,认识要超前;二是行动要保守,尤其是涉及采取到破坏现有资源和模式的措施,一定要缓行、慢行、三思而后行,或者说一慢二看三缓行。

我个人一直是图书馆现代化技术的鼓吹者,我所供职的深图也一直走在图书馆现代化技术的前列。但是遇到具体问题,就一定要采取慎重的态度。例如选择数字阅读还是纸本阅读,在个人来说是各有所好、见仁见智的事,但对图书馆就不一样了,因为涉及图书馆的馆藏模式和服务方针这样的根本大计,必须要有清醒认识和正确对策。因此,我们采取的对策是:图书馆数字化的发展方向是明确的,但目前图书馆的纸本文献仍然是不可缺少的。

这样讲主要是基于以下两个很现实的因素,或者说是非学理性因素:



dILAS系统



基于RFID的智能文献清点

1、社会纸质文献资源极为丰富，还没有被数字文献完全取代。图书馆有“传承文明”的社会责任，要为后人留下完整全面的文化遗产，因此不能舍弃纸本资源。

2、读者对纸质文献的需求很大，尤其是公共图书馆，我们不能忽略普通读者尤其是底层民众对传统文献的现实需求。

后者涉及图书馆的人文关怀，因此必须强调，不可漠视。

顾晓光：上个月有篇文章（<http://www.oclc.org/research/news/2013/10-01a.html>），分析一百多家高校图书馆的馆藏流通情况，数据来源于OCLC-OhioLINK相互协作的馆藏和流通分析项目，颠覆了以前我们所熟知的文献二八律，里面提到7.2%的馆藏占到了80%的流通量。还有一个数据同样让我很吃惊，80%的馆藏在一年内没有任何借阅。纸质资源流通量的下降在高校馆较为明显，在公共馆情况如何？

吴晞：变化不明显，深图纸本文献的借阅量还是非常高的。但是它被其他文献所代替是一件必然的事情。

我上半年在美国住过一段时间，发现Kindle非常普及，远远超出我的想象，价格也不贵。去年，Kindle的电子书销量超过了纸本书，有人认为这是一个拐点。

顾晓光：前几天，Kindle推出了一个计划：Kindle First，读者可以现在购买并提前一月阅读新出版的图书，购买价格一律1.99美元，Kindle Prime用户可每月挑选一本免费阅读，其余用户可用1.99美元购买一本阅读。以前，它还有一个政策：Kindle MatchBook，读者如果买了指定的图书，可以以免费、0.99、1.99、2.99美元的价格购买电子版。

您曾经说过“让阅读回归图书馆学的主流领域，让图书馆学重新审视阅读在学科中的重要位置，是一代学人的责任，更是图书馆工作的迫切需要”，图书馆在阅读推广实践上有没有误区或者偏差？需不需要图书馆去进行阅读推广启蒙？

吴晞：在2009年中图学会换届大会上，我被推选为阅读推广委员会主任。我出任这个职位，纯属“赶鸭子上架”。前届主任是北大王余光教授，他是多年从事经典文献和经典阅读研究的专家，也是这个委员会的创办人。当时我是副主任，又和余光教授是老朋友、师兄弟，给他唱唱配角，敲敲边鼓，倒是满合适的。换届时，规定各位副理事长都不再担任各专业委员会主任，余光教授自然也不例外，于是我这个对此本无研究造诣的副主任就被“扶正”了。

改唱主角后，工作十分忙碌辛劳，要跑到全国各地参加会议，组织活动，但也确有收获，确有所悟。所悟者，主要有两点：一是阅读推广应是图书馆学和图书馆工作的主流领域之一，多年来受到不应有的忽略，这就如同我初到公共图书馆界的感受一样；二是全社会和广大读者确实需要图书馆阅读推广，其重要性和社会效益不可小视。

先说图书馆学和图书馆工作。图书馆界的权威文件，如《公共图书馆宣言》，《中国图书馆服务宣言》，IFLA的相关宣言、决议、文件等，都把推进社会阅读、建立学习型社会作为宗旨、圭臬。这种精神是一以贯之的，涉及图书馆的核心价值和核心理念。这样重要的领域，我们的学科研究怎能是空白？

再从图书馆工作的角度看。有专家指出，“融合趋势”或是“综合发展趋势”（Development of Metropolitan Libraries）是今后图书馆发展的主流。这点现在已经是共识，而且已经被实践所验证。什么是“综合趋势”或“融合趋势”？通俗地解释，就是今后的图书馆不可能再按照老模式运作，满足于每日借借还还，看摊守点，必须全方位、多方面地开展工作，必须

要做那些不是传统图书馆工作的事情,做那些似乎是其他部门做的事情。我们既是图书馆,又是信息资源集散地(ICP),还是学校、展览馆、博物馆、音乐厅、文化讲坛、影视观摩厅、新书推介中心、学术交流场所、新技术体验中心,等等。只有这样,才能丰富和拓展图书馆的服务内容,提升和强化图书馆的服务品质,增强和扩大图书馆的服务影响。这种“融合趋势”或是“综合发展趋势”,主要就是通过阅读推广工作来实现的。

应该说,通过我们的不懈努力,现在形势有了很大的好转,不仅全国各地以图书馆为主体的社会阅读活动轰轰烈烈开展起来了,理论研究也跟了上来,而且发展态势也不错。我领衔申报的有关公共图书馆阅读推广的国家社科基金课题,已经获批。今年(2013年度)国家社科基金资助立项的课题中,阅读推广的课题破天荒地占到9个之多,而在2011年只有1个,2012年只有3个。成绩很是喜人,前景十分看好。

另一方面,我们的社会和广大读者也需要和欢迎图书馆的阅读推广。

全民阅读活动并不是图书馆一家的事情,但是我们还是要强调,图书馆是社会阅读的主体,要承担起独有的社会责任,完成他人不可替代的历史使命。为什么要这样讲?阅读虽然多种多样,但是我们还是要提倡深入的、学习型的阅读,通过阅读全面系统地掌握知识,而知识就是力量,穷则丰富人生,达则改造社会。即使是大众型、消遣性阅读,也要提倡多读书、会读书、读好书,通过有计划、有系统地读书,创建健康有益的文化生活。要进行深入系统的阅读,完整全面地掌握知识,图书馆是最好的场所,甚至是唯一的场所。只有图书馆,才具有完备的文献资源保障体系,才能为读书人提供全面系统的文献服务;也只有在图书馆,才能领略到完整的科学知识体系和全部的人类文化遗产,从而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来看这个世界。进入网络数字时代就更是如此,图书馆收藏的数据库集成成为不可或缺的社会主要资源。

当前理论界有人反对“深阅读”和“浅阅读”,或“读好书”的说法,认为图书馆工作者应该保持中立的立场,不干涉读者的阅读自由。此说当然有道理,读书没有高下之分,图书馆不应该排斥消遣性阅读,或是所谓的浅阅读,要提倡开卷有益,保障大众的阅读权利。但是我们必须清楚,在大众性阅读当中,图书馆同样也是最好的场所。这点和精英阅读、学习型阅读没有什么大的不同。即使是阅读《西游记》,也要读完全本,不能

只看电视剧或《大话西游》;即使是读武侠小说,也要按照“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的目录通读一遍,才算得上是初级的“金庸迷”、“武侠迷”。社会阅读中的诸多不良现象,我们也不能坐视其蔓延,如娱乐至死,不娱乐毋宁死,为应试教育读书,不唯功利不读书,等等。目前还没有任何社会机构在阅读这一功能上可以取代图书馆。

具体说来,我们的图书馆阅读推广工作要引导那些缺乏阅读意愿的人,感受阅读的魅力,享受阅读的乐趣;训练那些不善于阅读的人,包括少年儿童,使他们学会阅读;帮助那些阅读困难人群,包括残障人士,提供相关的帮助;更重要的是服务,对所有的读者、所有的市民,包括高层次专业人士,提供阅读的便利。这样的阅读推广活动,自然会受到社会各阶层人士的欢迎。

顾晓光:如您之前所说,图书馆有教育的职能。

吴晞:我们在做中国图书馆学会阅读委员会时,以前叫“科普与阅读指导委员会”,现在改为阅读推广委员会,这个更名是对的,但不能推卸你指导阅读的责任。毕竟我们比一般民众多接触了一些书,多掌握了一些文献专业的知识,我们有责任将我们的所知所想和经验告诉他们。最近有书是否有好坏的争论,毕竟书还是有值得推荐和不值得推荐之分的,经过专家遴选推荐给大家一些好书,至于他读什么是他的选择。人的一生中能读的书有限,应该读些好书。就像吃饭一样,我们一生中吃饭的次数是可以计算出来的,如果再多吃些垃圾食品,就不好了。营养学家总要告诉大家什么是垃圾食品,什么是健康食品吧。

顾晓光:您参与创立的“公共图书馆研究院”已经成立近四年了,成立研究院的初衷是什么?这几年来的发展达到您的预期了吗?公共图书馆作为社会服务机构,“为政府决策和法律法规制定提供研究依据”和“向全社会宣扬公共图书馆行业价值、提升行业影响力”在目前的发展阶段显得尤其重要,您认为当前我们公共图书馆的管理者和学者在这方面的成绩如何?

吴晞:我多年来信奉和恪守“研究先行”的宗旨,凡大事、大决策均要有研究作基础。但在公共图书馆界,“研究”恰恰是其短板,经常遇事拍脑袋、跟风,或是领导说什么是什么。仅仅看图书馆自动化、数字化一



公共图书馆研究院成立大会

事，就走了多少弯路，花费了多少冤枉钱，皆因缺少基本的研究。

当初创办“公共图书馆研究院”的起因就是想在公共图书馆界提倡研究之风，也向全社会宣传推介公共图书馆。研究院成立后，得到许多前辈长者和业界精英的大力支持。第二年我们起草了《中国公共图书馆发展蓝皮书（2010）》，可以说是该年度关于公共图书馆研究的集大成者。

我曾经设想为“公共图书馆研究院”这样独立于政府的半民间研究机构找到一个长久发展的路子，但由于生病和卸任，原有的许多设想没有办法完成。现在有关的研究工作主要由我担任主编的《公共图书馆》杂志承担。

顾晓光：您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曾任《大学图书馆学报》的副主编，现在也担任《公共图书馆》的主编和《中国图书馆学报》的副主编。作为为人作嫁衣的职业，编辑在这二十年的学术环境中，所起的作用有什么变化？您也担任多家刊物的编委，本专业的学术期刊对学术环境的影响达到您的预期吗？

吴晞：我在九十年代初期担任《大学图书馆学报》副主编，主编是林被甸馆长，我实际负责刊物的编务，同时还兼任《北京高校图书馆学刊》副主编。到深圳后，深图创办了《公共图书馆》杂志，我任主编。还兼任《中国图书馆学报》副主编和一些专业刊物的编委，不大管具体编务，但都会热心参与，各刊物开编委会我都会尽量参加。

对于专业研究，广而言之对于一切读写工作，我有发自内心的喜爱，乃至偏执。我在2010年出版的论著集《天下之公器》一书的序言里说：“我一直自认为是具备一些学者素质的。当然这不是指学问、才华、秉赋等，而是说我一直热衷于读和写，且不以为苦，乐此不疲。然而命运的安排却没有如我所愿，乃至一直没有做成专业的学者，至今还是‘玩票’的，只能‘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并假想此生如能专门以研究写作为业会有多么大的成就。”现在我依然持这种想法。

我给自己定下“功课”，有几种专业刊物是每期都要看看的，其中就有你任执行主编的《数字图书馆论坛》。好的刊物是可以看出编者的激情和眼光的。但是现在很多专业刊物令人失望，有的已经从我的“功课”

中抹去了。最令人反感是收取版面费发表论文，这不仅“曲学阿世”，简直就是出卖学术良心，兜售学术垃圾。我任主编的《公共图书馆》就明确宣布，永远不收取版面费，发表的文章全部都支付稿酬。

顾晓光：您在自我简介中说“欲为葛天氏之民，安可得欤！”，这句话挺吸引我。我能感受到您有“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无奈，更有对于自由、恬淡生活的向往。从内心来讲，对于这种理想生活，您更倾向于“出世”还是“入世”？

吴晞：若不是你这样问，我还确实没有认真思考过这个出世入世的问题。现在仔细想一想，真正让我奉为圭臬的还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奋斗哲学。

自小受家庭传统教育影响，相信“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后来逐渐明白，自己不是什么“天命在身”的人物，也不曾遇有什么“大任”，不过是平凡的图书馆员，但也应兢兢业业，恪尽职守，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倘有机会还要多发些光。我年轻时，有个口号是“革命加拼命，拼命干革命”，现在不提了，但我一直是以拼命的精神工作和治学的。当然也为此付出了代价，近年来做了两次心脏手术，想拼命也不行了。从2010年做了第二次手术后就不再主持深图的工作，

2012年正式卸任馆长，现在只担任深圳市图书情报学会理事长的虚职。

我也曾想过，如果当年老老实实留在北大做馆员加学者，或者在文化部做官员，是否会更好些，至少身体不会糟糕到如此地步。结论是不后悔，因为我是按照自己的人生哲学生活的，本应如此。

现在社会上盛行避世、养生的哲学，常常见到这样的文章流传，引经据典，振振有词，却很难打动我。现在身体差了，不注意养生也不行，但不想以保养身体为唯一宗旨来打发今后的日子。看淡名利固然不错，但不等同于混日子，或以些许可怜的小事自娱自欺。如今光热已经所剩不多，就更要让生命燃烧好，活得有意义。退出行政职务，无官一身轻，却也一直没有闲着，除了按计划撰文著书，还要履行阅读推广委员会主任职务外，今年还领下一个国家社科基金课题，又够我忙一阵。

古人讲“三立”，立德、立功、立言。审视自己，大概是更适合“立言”的，而且今后也只有“立言”一途，能否有成不可知，至少还有这样的追求。

顾晓光：谢谢您接受我的访谈。

（访谈日期：2013-11-06）

深圳图书馆简介

深圳图书馆始建于深圳特区成立之后的1986年。深圳图书馆新馆2006年建成开放,位于深圳市行政文化中心区内风景秀美的莲花山前,占地29,612平方米,总建筑面积49,589平方米。建筑出自著名国际大师矶崎新的设计,造型独特,构思精巧,极富现代感。建筑模式也从传统模式变为全开放、大开间、无间隔的“模数式”布局。它的落成成为深圳这个年轻而充满活力的城市增添了一道独具特色的文化景观。

作为深圳市图书文献收藏和利用中心及文献信息资源开发中心,深圳图书馆藏书量超过683万册/件,2012年图书外借量超过376万册次,日均接待读者过万人次(峰值26,000人次)。国际图联副主席鲍顿参观深圳图书馆后感慨地说:“我参观了世界各地的许多图书馆,这里可以说是世界上最繁忙的图书馆。”

深圳图书馆注重新技术的应用,在全国率先采用ILAS、DILAS和RFID技术。ILAS是由深圳图书馆主持研制、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并被文化部评为重大科技成果推广项目,在全国拥有近三千家用户;DILAS(数字图书馆体系结构研究和应用平台开发项目)是国家计委下达的国家级重点科技项目,已在深圳图书馆投入使用。深圳图书馆也是全国第一家全面采用RFID(无线射频技术)的图书馆,RFID的采用引发了图书馆业务管理模式的全面变革,给深圳图书馆带来了一系列技术飞跃。

2005年,深圳图书馆开始实行全面的免费服务。2006年深圳图书馆新馆开放伊始,在全国率先提出了“开放、平等、免费”的服务理念,坚持走“服务立馆”、“技术强馆”之路,全馆实行“全面开放、免证进馆、分层管理、一卡通行”的服务模式,服务区藏、借、阅服务交融为一体,为读者营造了便捷舒适、自主高效的阅读环境。

深圳图书馆多年来秉承最大限度地满足读者需求的公益服务宗旨,为广大读者提供简便、快捷的服务,除周一闭馆外每天9:00-21:00连续开放,每周对外开放72小时。面向所有公民开放,普通阅览无需任何证件,服务全部免费,号称“到图书馆来是不用带钱包的”。

根据深圳地区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状况,深圳图书馆在馆藏建设上,以高新技术、商贸、时装、法律等专题资源及深圳地方文献、台港澳文献资源等作为特色资源。

深圳市“图书馆之城”建设是保证市民基本阅读权益,实现图书馆服务均等性、便捷性的重要举措。深圳图书馆作为“图书馆之城”建设的龙头馆,一直致力于打造全城公共图书馆一体化、无差别服务。2011年,“图书馆之城”统一服务平台建成并投入使用。

目前,全市共有630家公共图书馆及200台“城市街区24小时自助图书馆”已经实现统一服务。读者持一张“图书馆之城”读者证即可在上述图书馆和遍布全城的自助图书馆上享受无差异、无障碍的图书馆服务。

作为“图书馆之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城市街区24小时自助图书馆”作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产品,被列入国家文化创新工程、深圳市2010年民生工程、2011年大运文化工程。

作为城市最基本的文化设施,深圳图书馆一方面是市民终身教育的知识殿堂,另一方面也是城市文化内涵和文化品位的重要象征;同时将进一步加强信息参考功能,为深圳的政府决策、经济发展、科技创新、学术研究等活动提供高层次的知识支撑和信息服务,实施深圳建设“图书馆之城”的文化战略,成为全市文献资源中心、信息网络中心和知识共享中心。

吴晞简介

1955年1月出生。深圳图书情报学会理事长，研究馆员。

1982年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毕业。历任北京大学馆员、副研究馆员、研究馆员，文化部图书馆司文献资源处处长。1998年至2012年任深圳图书馆馆长。现任深圳市图书情报学会理事长。

主要兼职：广东省图书馆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图书馆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图书馆学会阅读推广委员会主任，《公共图书馆》杂志主编，《中国图书馆学报》编委、副主编，公共图书馆研究院执行院长，北京大学兼职教授，中山大学兼职硕士生导师，深圳市政协委员。

主要荣誉职务：

美国图书馆学会（ALA）和美国公共图书馆学会（PLA）荣誉会员，文化部优秀专家，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深圳市政府专家，深圳市高层次人才。

主要业绩：

1998年任文化部项目“图书馆自动化集成系统（ILAS-II）”课题组组长、项目第一负责人。该项目1999年荣获文化部科技进步一等奖，广东省文化厅科技进步一等奖。

2002年主持筹建“地方版联合采编协作网（CRLNet）”，任项目第一负责人。该项目于2005年荣获国内文化系统最高奖——文化部首届“中国文化创新奖”。

2001年承接国家级科研项目“数字图书馆体系结构与应用平台开发”，任项目第一负责人。该项目2006年通过文化部主持的鉴定，项目成果d-ILAS在深圳图书馆新馆成功应用。

2007年承接文化部科研项目“城市街区24小时自助图书馆系统”，任项目第一负责人。该项目于2009年10月获第三届“中国文化创新奖”，并被列入“国家文化创新工程”。

2008年被评为文化部优秀专家。

2009年获得深圳市高层次专业人才证书，美国图书馆学会（ALA）和美国公共图书馆学会（PLA）荣誉会员。

2010年被评为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

2010年“城市街区24小时自助图书馆体系建设与服务推广”项目获文化部第十五届“群星奖”，为项目第一负责人。

2013年承接国家社科基金课题“公共图书馆开展全民阅读活动与建设学习型社会研究”，任项目第一负责人。

对图书馆学诸多领域有较深造诣和深入研究，正式出版专著15部、译著2部，发表论文120余篇。

曾获“文献资料智能排架分捡运送装置”、“图书馆自助终端”等五项国家专利，均为第一发明人。